

1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档案文献里的长征记忆(七)

吴组缃笔下的红军

王琪琪



寥寥数语,红军将士青春昂扬的群像跃然纸上。他们朝气蓬勃、崇尚和平、纪律严明、兼具学识,甘愿为理想信念、为国家的安危倾尽所有。这不仅与吴组缃之前在舆论引导下想象的红军不一样,也与他平常看到的一些少年人不一样。从他们身上,吴组缃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不禁为我们国家民族抱起很大的希望,这是我近来感想中最最好的一个”。在这里,两个“最”字,充分表达了他激动的心情,也表明了他对革命力量的认可与期许。

在今天看来,这篇文章或许稍显普通。但在当时,它在天津市民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很多人第一次了解了红军战士在长征初期的真实情况。它不仅是一篇短小的文学随笔,更是长征精神与天津这座城市产生深刻共鸣的历史见证。

回望那段岁月,天津与长征的联系远比我们想象得更紧密。当红军在万里征途上跋涉之时,天津的地下党组织和进步青年,正在用另一种方式进行着战斗。

1934年12月8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天津分会正式建立。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团体。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们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红军北上抗日,并发出“北方新苏区的建立与红军北上抗日的战斗相呼应”的新口号。1935年8月,中共北方局在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第44期刊发《北方局关于“九一八”工作的决定》一文,要求平津等城市的党组织尽快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后,党在天津的“特科”组织负责人南汉宸立即在党员中传达了这一消息和《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精神,研究制定了贯彻《八一宣言》应采取的方针、办法,从而为天津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题图分别为《野烟三周报》“迎春号”封面、吴组缃所著《一个最最好的感想》报影。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问世后,一个没有战乱纷争、百姓安居乐业、人人和諧相处的理想世界成了历朝历代许多人心驰神往、孜孜以求的梦想。正因为这个梦在古代难以成真,后人便把幻想中的理想社会叫作“世外桃源”。

但若细细分析,《桃花源记》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并非高不可攀、无法复制。暂且不说改造整个天下,落实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其实大都可以通过努力奋斗,营造属于自己的小“桃花源”。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的是怡人的自然景致,芳草繁花,林木相映。就今日而言,若是自家有小院,便可房前植桃,屋后种竹,门前摆花,院里植草,风光较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不差多少。如果住在高楼,那就在方寸之地巧为安排:屋里有鱼缸,看游鱼浮沉嬉戏,游鳞摆尾;阳台挂鸟笼,听莺歌燕语,婉转啼鸣,再在坛坛罐罐里种上花花草草,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同样的赏心悦目,打造出一方花团锦簇的桃花源。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勾勒出百姓安居乐业、生计殷实、衣食无忧的生活图景。今天,我们依靠劳动所得,可以安居于敞亮的楼房,搭乘四通八达的高铁出

营造自己的“桃花源”

陈鲁民



行;享用良田馈赠的四季蔬果,品尝美池出产的鱼虾水产。兴致来时,可以远赴江南桑蚕之地,领略水乡温婉;也可以去往川黔竹海,饱览林木蓊郁、青翠欲滴的盛景。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描绘了桃花源安宁祥和、农家聚居的田园风貌。田间小路纵横交错,鸡鸣犬吠此起彼伏,映衬着当地人丁兴旺。如今的中国国力强盛,社会和平安定,我们得以安享太平岁月,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不正是陶渊明当年所憧憬的人间胜境吗?反观世界上一些战火纷飞、的地区,我辈更应知福惜福,格外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也是陶渊明心中美好的期许。意即老人和孩子都安逸愉快,各得其乐。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肯定是个遥不可及的奢望,而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难事。辛勤耕耘劳作,积累物质基础,我们便可以让家中的老人颐养天年,健康长寿,乐享夕阳红;让孩子无忧无虑、天真烂漫,在幼儿园与各类学校里接受良好的教育,生活幸福,茁壮成长。

至于文中村民“设酒杀鸡作食”的欢聚宴客,当下更是寻常光景。鸡鸭鱼肉已是咱们餐桌上的日常,山珍海味亦不再稀罕。亲朋好友时常相聚小酌,美酒飘香,笑语盈盈;逢年过节,合家团圆,佳肴满席,觥筹交错,恰如古诗所写:“家家扶得醉人归。”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虚构的乌托邦,是在战乱和贫苦中做的一个美丽而无奈的梦,在他所处的时代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今,国泰民安,我们性逢其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奋力打拼,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营造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让小日子越过越红火。待到千家万户的小小“桃花源”蔚然初成,全社会的大“桃花源”自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倘若有人发问:“桃花源”究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或可以从容而淡定地作答:“桃花源”就在我你身边!

红军长征的进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蚕食华北的侵略阴谋,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在此紧要关头,国民党军队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在其统治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进行残酷镇压,并对红军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据当时的南开中学学生白文治回忆,那时,国民党的报纸上经常用大标题登载中央社所发红军杀人放火或被困剿歼灭的虚假信息。

但天津广大的进步学生、工人和各阶层群众,仍然竭尽所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红军的一些真实情况。他们冒着白色恐怖的威胁,以多方搜集到的红军真实信息和自己的所见所闻为基础,印发传单、出版刊物,将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传递给每一个渴望光明的人。据载,中共天津市委曾印发《欢迎红军北上抗日》传单1000份,在主要街道和一些群众聚集区张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在青年学生和市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在诸多进步宣传活动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创办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刊物《野烟三周报》尤为亮眼。1934年10月,该刊正式创办,由天津博古书局出版发行。其覆盖范围较广,分销处远至上海、北平、山东、陕西、安徽等地。章靳以、吴组缃等文艺界知名人士为该刊物撰稿,发表了许多揭露黑暗、追求光明、向往革命的诗歌、散文、小说,好评颇多。《益世报》曾刊文盛赞该刊“内容颇为充实……青年间将多一密友,天津文坛将现一彗星也”。

正如《益世报》所喻,《野烟三周报》的确如同彗星,但其存续时间虽短,却光芒持久。据相关史料记载,受时代环境影响,该刊持续时间不长,仅出版两卷4期就宣告停刊。然而,其编撰团队在白色恐怖之下敢于撰文发刊、针砭黑暗现实的勇气,至今仍令人肃然起敬;刊物留存的篇章佳作,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其中,1935年1月,该刊“迎春号”刊发的吴组缃的文章《一个最最好的感想》,更是弥足珍贵。据考证,这是天津第一篇描写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

吴组缃,原名吴组襄,安徽泾县茂林人,著名作家、古典文学研究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理事,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北京文联副主席,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1934年年底,吴组缃回安徽泾县老家探亲,机缘巧合之下,他见到了真实的红军。

他为何能在这里见到红军?他遇到的又是哪一支队伍?据《闽浙皖赣苏区简史》记载,1934年12月15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泾县茂林方向转移,又经茂林折向西,进至泾县水东翟、太平县新丰一带。此前,抗日先遣队进行了改编,原先两个师被整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据《野烟三周报》标注,《一个最最好的感想》成文于1934年12月25日。结合史实、文章内容与成文时间,吴组缃看到的红军部队,很有可能就是红十军团中的第十九师、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

吴组缃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记录下他与红军的这次接触。他坦率地承认,红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一把茅草胡子,像戏台上二花脸那样的人”。相反,他们大多“是十三岁以至上十九二十岁之间的少年……他们都穿着夹衣,身上佩三四支盒子枪,扎一把稻草或是竹子在头上……”官军来了,就一个滚打到跟前,摇摇头,叫不要放枪;到了非开枪不可时,他们才开……“他们的纪律很严,秩序很好。精神尤其可佩:不怕死,不想家,这不是容易的”……

满庭芳

第五四九六期

性或许已基本确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曾精确表述:“今成阳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二者毗邻相依,符合上古时期王族母子同域归葬的礼制。《汉书·地理志》也明确记载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家、灵台”,灵台就是祭祀尧母的场所,汉章帝时期还曾专门遣使祭祀尧母,说明从汉代开始,成阳就是尧母庆都陵所在地。目前,成阳故城(菏泽牡丹区胡集镇)的考古勘探已经基本确认,在尧陵南侧1公里左右,确实存在和文献记载位置吻合的古代大型遗址,与传世文献的记录基本吻合。

历史上关于尧陵地点的争议早就发生过,清乾隆年间还曾引发尧陵地点的朝堂争议,乾隆初期,山东巡抚岳凌主张祭祀地在山东濮州(今鄄城)。后来,有官员认为应在山西平阳(临汾),最终乾隆帝维持了在濮州祭祀的传统。古雷泽区域祭尧传统可追溯至公元85年,后来祭祀重心转移到鄄城谷林,官方祭祀延续至1905年,历时一千八百余年。而临汾尧陵的大规模祭祀活动主要是近现代恢复的,历史延续性较弱。大致来说,汉代至北宋时期的祭祀是以山东菏泽尧陵为核心的,有说东汉朝廷在今山东菏泽鄄城尧陵设立官方祭祀,此后延续近千年。唐代,官方祭祀地点未变,唐太宗李世民东征时曾途经临汾拜谒当地尧祠,但未将其列为国家级祭祀场所。北宋末年,黄河泛滥导致菏泽尧陵被洪水淹没,祭祀活动被迫临时迁至山东东平,形成“东平祭尧”的过渡状态。金元时期,菏泽尧陵因黄河泥沙淤积彻底埋没,官方祭祀长期在东平延续,乾隆元年(1736),山东巡抚岳凌上书朝廷,考证菏泽尧陵为历史原址,请求恢复祭祀。后来,乾隆帝批准在菏泽重建尧陵,并御书“殷林云日”牌坊,形成东平与菏泽两地同时祭祀的局面。乾隆后期,乾隆帝曾派人赴菏泽鄄城谷林尧陵拜谒,进一步确认其地位,但东平尧陵的官方祭祀也并未完全废止。清末至民国时期,菏泽尧陵再次被黄河淹没,祭祀活动中断;而临汾尧陵因地处相对稳定的山西南部,逐渐成为民间祭祀的主要场所。也就是说菏泽的尧陵因为处于黄泛区的原因,经常没于洪水,所以祭祀地改为别处,但若追溯本源,很多学者认为尧陵原址在菏泽。

关于菏泽境内的成阳尧陵和谷林尧陵之争,两地相距只有四十余里地,更像是一体两分,2017年学界召开“成阳故城与帝尧陵研讨会”,重新确认成阳尧陵的遗址价值,这相当于一次复古性回归,尧陵何家正统、先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面对华夏文明始祖心中涌起发自内心的温情和敬意。

现在的成阳尧陵已被建成尧陵寻根文化区。目前建成的景观包括:帝尧庙、祭祀广场、尧鼎等,整体氛围庄严肃穆,气势宏伟。自2016年起,当地开始举行全国性大型祭奠活动,每年农历二月初十还会举办尧王诞辰传统庙会,吸引周边近万名群众参与。尧陵的封土堆很大,上面植被丰茂,四周筑有保护性的水泥围墙。尧陵遗址文保碑立于附近田野之中,野花掩映,微风轻拂,气氛宁静安详,让人流连忘返。

中午时分,我们到约好的雷泽古寺参观、就餐。雷泽古寺是黄河文明与佛教文化交融的千年古刹,就在上古雷泽(又称雷夏泽)遗址东南侧,毗邻成阳故城。这里是传说中华胥偃迹生伏羲、舜帝渔猎雷泽的文化发源地,被誉为“龙凤之源、尧舜故里”。据《重修雷泽寺碑记》记载,雷泽古寺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相传隋炀帝为镇伏黄河水患,依高僧建议在雷泽县城东大街建寺,此后唐宋至明清时期,一直被奉为当地政府唯一官寺。唐代时寺院香火鼎盛,古柏苍翠,殿宇壮观,高僧辈出,成为华夏佛门圣地。金大定八年(1168),寺院被黄河淤沙淹没;明清时期曾多次在原址重建和重修,最后一次大规模重修是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由法贤和尚率众恢复祖刹,碑文记载当时“晨钟暮鼓,金装石碑,佛像煌煌,僧众云集”。清末民初寺院再度荒废,“文革”期间被破坏殆尽,仅遗一钟一残碑。2008年,由释道续法师牵头,启动了雷泽古寺复建工程,在当地政府和信众的大力支持下,短短几年,一座美轮美奂的辉煌殿堂拔地而起,初成规模。

释道续法师年纪不大,四十岁出头,出生于新疆,出家之后走过很多地方,最后落脚于此,发愿在一片废墟上重建雷泽古寺。他是一位身体力行的苦行者,不但是一个出家人,还是一个建筑设计师、泥瓦匠、油漆匠,总之只要建庙需要什么,他就去干什么,尽量亲力亲为,把质量搞到最好,成本降到最低。在他的主持下,古寺由此重光。

下午,我们踏上了归程,汽车在四通八达的原野上纵情地驰骋,我感到自己与乡土的情感又深了一层,心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贴得更紧了。

耿传明



成阳故城·尧陵·雷泽古寺

初夏到故乡山东菏泽小住,闲暇之时,与几位喜欢乡邦文物、考古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得热闹非常。我想起《荀子·性恶》中所说的“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觉得我们的坐言起行应该连贯起来,光闷在屋子里空谈不行,还是应该到田野实地去考察一下。于是大家约定了一个时间,准备到附近几个新发现的点去转转。我们出行的主要筹划者是王君,他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刚从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对于家乡的文化事业特别热衷。王君和当地的相关部门很熟,把这事和几个朋友一说,他们都很赞成。区委统战部一位四十多岁、非常干练的女部长自告奋勇地给我们当司机,她是清末四大奇案当事人之一马新贻的族人、同乡,这次去的地方离她老家马垓不远。同行者还有一位考古专家田君,他还是一位剧作家,负责给我们介绍情况。

我们要走访的第一个地方是成阳故城,据介绍,成阳一名,《史记》写作城阳,在今菏泽城东北的胡集村东。遗址下层存有龙山文化遗存,后世有文献记载此地为尧时都邑所在;现存城垣主体为汉代所筑。汉高祖十二年,置成阳侯国,汉建元元年,设成阳县,属济阴郡。汉代皇室自称帝尧后裔,将成阳定为祭祀帝尧的场所。成阳故城历秦、汉、魏、晋、北齐废。唐于此城复置雷泽县,属濮州,历唐、五代、宋。金贞祐二年废县为镇,后圯于黄泛,明代于此置平阳县。成阳故城最早发现于1958年,2007年至2008年,经考古调查与试掘,确认了成阳故城与尧陵遗址的性质。2017年,经发掘最终认定成阳故城墙体南墙长1475米,北墙长1457米,东墙长690米,西墙长700米,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城垣在汉代大规模修筑,延续千余年。之后被洪水淹没、黄土覆盖于地下,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

成阳故城地域现在“胡集村”的名字我倒很熟。因为我小时候,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属于胡集公社,这里曾出现过一位闻名全国的劳动模范,那就是领导群众治沙的胡集村党支部书记胡景灿,他曾被周恩来总理接见,担任过中共全国第九、第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于1984年去世。当时胡集这一带属于大风肆虐、黄沙弥漫的黄泛区,与河南兰考的情况相似,两地实际相距也不是很远,胡景灿和焦裕禄一样,都以领导治沙工作著称。

那天,我们乘坐的汽车从城里出发,一路向东,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成阳故城,但因为故城还是考古重地,没有开放,外边围着围挡,所以我们只能在外围遥望一下,没能进去。故城旁边都是一马平川、一望无际的田野庄稼,如果没人告知,谁也不知道这底下埋着一把可以开启我们华夏文明起源之谜的钥匙。成阳故城——尧陵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传说中的唐尧文化从神话传说,从文献记载,推进到有地下考古遗存可相互参证的层面,佐证了黄河下游是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起源地之一。

离成阳故城不远,就是成阳尧陵。现在存世的尧陵颇多,关于真正的尧陵究竟何在,存在一些争议。现有的尧陵著名的有山西临汾尧陵、山东东平尧陵、山东菏泽鄄城谷林尧陵等,其中山西尧陵的相关记载比较丰富:《汉书·地理志》中提到,“河东郡平阳,尧都在此,有尧陵”,平阳即现在的临汾。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明确记载“尧陵在城东郭外,涝水之北”,位置也与如今临汾尧陵相吻合。后续的《太平寰宇记》《平阳府志》等地方史志也延续了这一说法,且此处现存明清时期的祭祀建筑,历史祭祀活动延续时间较长。但结合地下考古发现,山东菏泽尧陵的证据现在越来越充分,《吕氏春秋》记载,“尧葬谷林”,“谷林”现在地名未改,就在菏泽市鄄城县境内。《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也都标注曹州(今菏泽)有尧陵,2011年12月,鄄城县富春乡水利部门在尧陵陵区范围内开展水利工程施工时,意外挖到了石质构件,当地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随即赶到现场开展抢救性发掘。经过近一个月的清理,一共出土完整石构件105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刻有“殷林云日”四个楷书大字的正间额枋,落款明确为“乾隆四年蒲月谷旦”,坐实了牌坊的修建年代。额枋“云日”指的就是帝尧,出自《史记》对尧“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的赞誉,象征其德泽如云、如日般普照大地。综合文献与考古线索,不少学者认为尧原始葬地在菏泽,当然尧陵地望之争并未平息。至于菏泽这两处尧陵,我觉得彼此并不矛盾,因为成阳靠近黄河,常有水灾,祭祀不便,可能就置备一个预备方案,当地淹了就改为距此不远的谷林,两者何为先,我认为是成阳,因为成阳不但有尧陵,还有尧的母亲庆都的陵墓,结合史籍记录和考古发现,成阳尧陵的领先

津派文化大家谈

王襄先生有两部著名的甲骨学著作:《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如果说《簠室殷契类纂》是一本保留早期甲骨文字考释成果的甲骨学字典,那么另一部著作《簠室殷契征文》则是其个人收藏甲骨文并对其进行内容分类和史料解读的著录书。

1925年,王襄根据自己所藏的甲骨文,著录成《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出版,共收录甲骨1125片,分为天象、地望、帝系、人名、岁时、干支、贞类、典礼、征伐、游田、杂事、文字等十二类,各为一卷,每篇后都附有释文解读。从此书可知,王襄在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在郭沫若、唐兰、于省吾之前,对于甲骨文字的考释与证史工作作出了极大贡献。

《簠室殷契征文》学术成就与贡献

王襄收藏的甲骨中,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史料。王襄的严谨考证和认真释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有些问题也引发了一些激烈的学术论争。

比如王襄的甲骨学研究,非常注重对殷商时代礼俗的探究。翻开甲骨文材料集大成著录书十三巨册的《甲骨文合集》,收在第1页第1版的[王]大令众人曰荔田,十一月”,就是王襄旧藏,可见此片甲骨的重要性。王襄在此书中对该片内容作了最早的解释:“荔,祭名;田,即田祖。”这是一种祭祀土地神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田神礼。关于“荔田”,后来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数认为这是一种农业耕作的方式。但三代之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甲骨文作为与王室有关的占卜事项,要么战争,要么祭祀,要么田猎等。它极少反映当时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东西。王襄的这一解释,被著名古文字学家张政娘认可,张先生另作一篇《殷契协田解》论证并补充了王襄的观点,后世每年开春,皇帝在先农坛主持开耕典礼,应该说就是对商代农业祭田礼俗的保留和发展。

再如王襄甲骨藏品中有非常珍贵的涉及当时“日月食”的材料:“癸酉贞:日夕有食,隹若? 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王襄在该书“天象”卷中著录为第一页第一片,率先考释了这片甲骨:“癸酉日占卜,这天下午至傍晚将会发生日

食,占问这是吉利的征兆还是不吉利的征兆。”这是学术界较早揭示甲骨文存在商代日食相关占卜记录的文献之一。

对于这次日食发生的具体日期,学术界后来有过很多争论。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天文学研究的争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在前些年我国学术界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这批材料得到了充分利用,是年代学相关研究中的重要参考资料,意义非常重大。

《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引起的风波

王襄的甲骨学研究,早期并不为人们重视,尤其是其《簠室殷契征文》出版后,还引起部分学者的争议,甚至斥为造假

甲骨文与天津(七)

《簠室殷契征文》及其学术风波

朱彦民



究真的水平不高吗?

其实,王襄的甲骨收藏和甲骨研究论著,在那个时代,达到了甲骨学发展的极高学术水平,一些观点当时就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于一些学者认为王襄书中造假,实在是个冤案。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要从王襄先生《簠室殷契征文》一书的编著过程说起。

《簠室殷契征文》所收录的拓片,都是王襄从1899年以来所购甲骨的自制拓本,拓印精良。作为早期甲骨收藏家的王襄精于鉴别,所收甲骨没有假片。但王襄为了在拓本编排上节省篇幅,易于印刷,也有为美观,同时也减少印刷费用,就将拓本上没有文字的边缘部分大都作了规则形的裁切,而且为了印刷效果清晰,在上石印刷前对个别文字漫漶不清的拓片加以描摹,致使一些学者一度怀疑此书所收甲骨为伪片伪品。

比如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即说:“伪片之传播者,在中国则当推天津王襄的《簠室殷契征文》一

书,此书所列几于片片可疑,在未见原片之前,作者实不敢妄事征引。”王襄所著文辞均经剪辑粉饰,未能存其真,殊为可惜”。

由于郭沫若之“甲骨四堂”之一,名气较大,一时之间,受他的影响,也有其他学者认为:“王书纸厚墨重,笔划侵蚀,字形恶劣,讹误百出。”“殆王(襄)氏摹刻而自欺欺世也。”“印刷不精,且多剪辑”,“多以材料可疑,拼凑而不用”。据说,王襄收到诋毁他著作的信函就有厚厚的一沓子。而王襄自己却非常自信,坦然处之。他曾说:“塞口易,塞心难。终有河清之日也。”

对于这场学术上的冤案,许多学者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胡厚宣、郭子风、孙海波等人,都站出来为王襄辩护。罗振玉借用王襄所藏甲骨拓本,编辑为《殷虚书契续编》著录出版。孙海波有专文《簠室殷契征文校录》,力证其片片皆真。胡厚宣在《殷墟发掘》一书中也明确指出:“王氏精于鉴别,书中并无伪品。”郭子风在《甲骨书录解题》中也辨析说:“王书材料非伪,唯因各版割裂割夺之处甚多,复由作者手加摹写,故文字失真,有似于伪耳。”

1933年,这场学术公案中,作为最早提出质疑的学者郭沫若看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续编》,其中就有王襄所藏甲骨拓片相关内容,这才认识到自己当年看法有误。于是,郭沫若就在《卜辞通纂》述例中,公开承认了自己误解王襄的错误:“余曩言其伪,今案乃拓印不精,文字多上粉,原物不伪,特附正于此。”而且郭沫若在自己的一些学术论著中,也一再征引王襄的学术观点。

1965年王襄去世,郭沫若还应胡厚宣邀请,郑重为王襄题写了墓碑。此时郭沫若再次提到由自己引发的这场学术冤案,表示非常抱歉。如今,在天津北仓公墓内,有一个墓前立着由郭沫若书写的墓碑“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同志之墓 一九六五年郭沫若题”。

王襄可以说是天津甲骨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对甲骨学研究有很高的造诣和学术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而作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是一位勇于改正错误、敢于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学者。他曾写有相关文章,订正旧说,改正自己以往的学术观点。这种勇于自我批评、尊重学术道德的品格,是值得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学习和借鉴的。

题图为《簠室殷契征文》“日月食”材料(可以看出拓片有裁切痕迹)。

